

# 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的代际衍变与艺术贡献

周燕芬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本文将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当做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局部存在, 以地域性的陕西文学为切入口, 探讨中国长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时代变革, 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独到的艺术贡献以及历史的局限, 当下的困境和问题, 进而引向对未来文学发展的预期性思考。

**关键词** 陕西; 长篇小说; 代际衍变; 艺术贡献

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中, 长篇小说的创作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某种程度上说, 新中国以来的文学时代, 就是长篇小说的时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实绩代表着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 相应地, 长篇小说创作上的局限, 也是这一时代文学的问题所在。这就使得长篇小说的研究, 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和途径。

中国国土的幅员辽阔和多民族共存的状态自然形成了丰富复杂的多元区域文化, 各种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又造就了各自不同的文学群落及其文学审美形态。客观说, 各种区域文化在中华民族大文化中的构成性影响并不是平分秋色的, 因此多样化的地域性文学的成就以及与中国整体文学的构成和影响关系也并不能等量齐观。相对来讲, 以周秦汉唐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为源头, 以发生在陕西境内的延安文艺为母体, 陕秦文化滋养下的当代陕西文学创作, 既表现出独具一格的地域性文化和审美特征, 同时在中国当代文学迁延变化的几个历史时期, 都带着更为典型的民族国家文学的总体思想气质和艺术特征。换句话说, 中国当代文学之脉, 始终强烈地跳动在陕西文学创作当中。陕西以群体的创作规模构成了当代文学的非凡气势, 推动着当代文学的进程; 同时, 陕西作家所创造的优秀文学作品, 在当代文学不同的阶段, 都相当程度地代表着时代文学的一流水平, 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 《保卫延安》《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废都》《白鹿原》《秦腔》等

作品,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陕西由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之一。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具备着超越地域性的文化和审美品质, 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研究, 既是对地域性文学研究的拓新和深入, 也有超越地域性研究的递增值和全局意义。

本文将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当做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局部存在, 以地域性的陕西文学为切入口, 探讨中国长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时代变革, 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独到的艺术贡献以及历史的局限, 当下的困境和问题, 进而引向对未来文学发展的预期性思考。

陕西作为当代文学重镇的地位和影响, 与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持续走高有很大关系。如果从长篇小说的创作来看陕西作家的代际演变, 柳青和杜鹏程代表的应该是第一代作家群体, 他们以时代性的厚重卓越之作, 居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显著位置, 也持续影响了陕西的后辈作家。

当代陕西文学的直接源头是延安解放区文艺。从某种意义上说, 建国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就发端于解放区文艺, 是解放区文艺的直接和全面的延续, 那曾经是一种互为滋养、水乳交融的关系。作为当代文学前身的解放区文艺既在汉唐气象、古都傲气的氛围中振奋了民族自强自立的内在精

收稿日期 2013-09-06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陕西女作家研究”(11K007)

神，又现实而具体地吸取了陕北民间艺术的精华，营构出新中国文艺的雏形面貌。早在延安时期，与赵树理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追求相一致，杜鹏程、柳青等作家开始了自觉实践《讲话》方向的文学活动。柳青的前期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就是新的文艺思想指导下的新收获，他建国以后的创作从文学观念到审美风格都与前期一脉相承，是这一基础上的提高和深化。

正因为陕西文学植根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深厚土壤，与解放区文艺融为一体，所以，陕西文学得天独厚，承接延安文艺传统，顺应时代文学主流，在新中国逐渐一体化的文学环境中，陕西文学适应性强，成长迅速，杜鹏程和柳青以他们的长篇创作成就在新中国文坛上脱颖而出，都具有相当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十七年”这一特殊时代估论文学成就，分量最重的无疑是长篇小说创作。如果以1956年为界将“十七年”小说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的话，1954年出版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1960年出版的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恰恰是这两个阶段最有代表性和备受关注的作品。《保卫延安》在中国当代文学起步途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以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为案例，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问题可以深入讨论。

首先从作家主体及其相关文学创作的发生与完成角度来看。杜鹏程代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居于当代文学首要位置的第一代作家，这一代作家大都经历了相似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他们都是早年投身革命，由于革命的需要而深入生活，体验革命人生，认识和理解革命思想，也积累了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宝贵素材，他们是为了革命拿起笔写作，进而萌发了终身从事文艺创作的念头。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他们与时代精神相呼应的文学成就构成了新中国文学的主流阵营。因为特殊时代的关系，这一代作家普遍存在知识素养和专业训练欠缺的问题。比较幸运的是，从1942年开始，杜鹏程在延安大学有过三年集中和系统的读书生活，这对杜鹏程以后从事写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另一个对杜鹏程的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具有塑形作用的是此时发生在延安的整风运动。如果说在延安大学之前参加的革命实际工作，对杜鹏程来说还没有上升到政治理性和创作源泉的高度去认识，自己还并不能深刻地理解投身伟大的群众运

动的重大意义，那么，经过参加延安整风，经过对毛泽东《讲话》思想精神的理解和接受，使杜鹏程的政治觉悟和文学意识大大增强了，他的革命作家的独特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也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普通革命者到一个革命作家的角色转换也在有意无意之中开始了。1947年延安保卫战开始后，杜鹏程作为随军记者上了前线，那时候的随军记者，其实就是部队的成员，杜鹏程除了进行新闻采访，还一心想为自己的创作体验战斗生活，积累战争素材，他选择到部队的最基层扎根落户，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都和指战员们生活在一起。就在与官兵们相濡以沫的战斗生活中，杜鹏程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战争日记》，酝酿和准备着他的《保卫延安》。不待说小说所表现的延安保卫战是真实的战争事件，小说的发生背景，几位伟大历史人物都是真实的记载。就连小说中周大勇连队的主要故事也是以这个连队为基础，周大勇、王老虎等主要人物形象，其原型也来源于此。毫无疑问地说，没有真实的延安保卫战，没有杜鹏程亲身经历过的部队生活，就没有小说《保卫延安》。《保卫延安》的成功创作，是那个时代阐释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生活关系最典型最有力的例证。从《战争日记》到《保卫延安》，告诉我们革命文学何以会发生，也告诉我们，“老杜绝不是文人意义上的作家，他是战士意义上的作家，是革命家。”<sup>①</sup>杜鹏程的人生道路与他的革命道路一致，他的生活实践与他的思想认识同步，也与他的文学创作经历同步，他是典型的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型的现实主义作家。探讨杜鹏程每一个单元的文学创作的发生，都不外乎“投入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三段式，这在“十七年”一代作家那里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其次从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所具备的史诗品格讨论新中国文学艺术方向的确立。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有一句很著名的作家自述：“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sup>②</sup>杜鹏程是带着一个伟大的文学梦想投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创作之中的，对于他来说，这也不啻于一场艰苦的文学征战。不只是杜鹏程一个，一代共和国作家集体进入了一场新时代的文学征战，他们以文学的形式再次走入刚刚过去的血雨腥风的革命岁月，用他们激情的笔墨为共和国的诞生构筑文学艺术的“史记”，为新时代的开局和新政权的确立，提供了不可撼撼的历史合

法性证明。《保卫延安》从面世到现在，人们最为关注和最多研究的，就是作品所具备的“史诗性”文学特征。最早从“史诗”角度评价《保卫延安》的是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他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的长文中指出：《保卫延安》“是够得上称它为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总可以说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它的英雄史诗的基础是已经确定了的。”<sup>③</sup>冯雪峰从《保卫延安》对于时代精神的张扬，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对于长篇小说史诗构架的初步探索，以及因此而显现出的崇高文学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地论述，肯定了《保卫延安》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开拓意义。《保卫延安》应合了时代对于文学的期待和要求，全力写出时代必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探索性地构筑了“革命战争史诗”的艺术框架，确立了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范式，虽然仅仅是起步，但这一起步在当时还是令人满意的，其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它达到了时代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准，使得《保卫延安》成为代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新文学成就的一部佳作。

冯雪峰在总结了《保卫延安》之前十余年的战争文学后说：“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也就是说，即使它还不能满足我们的最高要求，也总算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部。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它在“艺术的技巧或表现的手法上当然还未能达到古典杰作的水平”，“在艺术描写上留有今后可以一次又一次加以修改和加工的余地”。“但是，即使再加工，也不是现在，应该在作者的才能更成长和更成熟的时候。我们现在先应该满意这样的成就。”<sup>④</sup>可见，冯雪峰在当年给予《保卫延安》高度赞赏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了作品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今天来看，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英雄人物的理想化，反面人物的脸谱化等“十七年”小说普遍存在的弊端，在《保卫延安》中已经出现。在谈到杜鹏程创造的彭德怀形象时，冯雪峰就说：“要把这样的高级将领的精神和性格，全面充分地描写出来，以造出一座巨大的艺术雕像，是只有天才的艺术大师才能办到的。作者当然还只是一个开始在成长的尚未成熟的天才。”<sup>⑤</sup>冯雪峰反复讲到的人物塑造的“不充分”和作家艺术才能的“不成熟”，意味着他清楚地看到了这部共和国初期的长篇小说存在

着难以克服的艺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批评家已经意识到这不仅是作家个体的写作能力的限制，也是特定时代的局限。作为一部战争小说，《保卫延安》明显缺乏广博深厚的战争文化内涵的思考，正如陈思和所揭示的：“如果创作者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和非理性状态，从战争中生命力的高扬、辉煌和毁灭过程里揭示它的美感，把它转化成审美形态表现出来，那么，严肃的作家充其量只能达到《保卫延安》这样的高度而不能更进一步，至于一般作家，就只能在战争背景下写一些传奇性的英雄故事而已。”<sup>⑥</sup>虽然1957年出版的吴强的战争小说《红日》，相比于《保卫延安》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思想的禁锢和文学观念的限制，始终难有根本性的艺术突破。

《保卫延安》作为共和国童年时期的小说样本，标识着一个令人欣喜但也亟待成长的时代文学的新起点。1960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问世，这部同样出自陕人之手而轰动全国的长篇巨制，与之前的《保卫延安》一起，分别以革命历史题材和农业合作化的现实题材，代表了建国后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大题材类型。作品在对50年代震荡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的全方位展开中，再次进入对中国农民人生命运的揭示和思考。小说一出版，就被称为是当代农村题材的史诗性作品，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柳青模拟外在社会生活的文学思路，贯穿在写作中的自觉、明确和坚定的政治意识，塑造特定时代需求的“新人”形象，以及传达时代精神、负载作家的理性思考和政治激情的叙述方式，都显示着一种时代文学既定艺术规范的业已形成。《创业史》是“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一个代表，也是“十七年”长篇小说艺术范式的一种标本性的证明。柳青的《创业史》之所以在五六十年的长篇小说中成为翘楚并为主流文化所认同，首先因为作家积极主动地应合了时代的政治期许，实现了作家个体与时代社会的共一关系；在此前提下，还因为柳青最大限度地坚持了艺术上的独立精神，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肯定《创业史》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成就，比如塑造出既有历史内涵又具生活智慧和人性体温的梁三老汉等中国农民形象；比如柳青颇见功力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让笔下的农村生活故事有着永不褪色的艺术感染力。这些都是柳青长年浸润“艺术的学校”磨练功力而得来。相对而言，柳青是“十七年”革命型作家群中具有良好学识结构和艺术素养的一位小说家，《创业史》

被认为是建国后“新的文学话语和叙述方法的参与者和建构者”，是“革命文体”的创造者<sup>⑦</sup>，同时也要看到，柳青也是现代小说艺术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和发展者，《创业史》发散出的中国传统文学与苏俄现实主义文学的气息，证明了柳青自觉吸纳和融合中外小说艺术经验的气度和能力，这大概是我们一直感受到《创业史》丰富和深厚的原因所在，也是柳青的艺术个性所在。即便“十七年”间被作家集体信奉的“深入生活”，在柳青这里也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姿态，他把自己安家皇甫村十四年艰苦的生活体验，当做“唯一适合我这个具体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既不动摇也不宣传<sup>⑧</sup>，他将这种首创性的生活方式和认知生活方式，纳入了自我选择、自我适应的艺术个性之中，使之成为小说创造的有机构成部分。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再度评价《创业史》到底“写得怎样”？我们难以割舍这本小说，其实是因为它从多方面提供了今天我们还能引以为镜的艺术经验和启示意义吧。

从现代长篇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看，上个世纪的1950年末到1960年初，长篇小说呈现出情节结构与性格结构并存且二者相互结合、逐步转化的发展态势，情节线和性格发展线二者经纬相织，复线式立体式史诗结构俨然出现。严格地讲，《保卫延安》的侧重点仍旧是革命战争史，这是由于英雄性格史的不成熟造成的。《创业史》则以英雄人物为中心来结构作品，并带动巨大的历史事件同时运行，从而把广阔的社会生活引入作品，形成庞大而深厚的艺术画面。柳青以立体网状结构突出作品的艺术整体性，营造宏伟的史诗巨著，显然代表了当代长篇小说的一次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在新的小说观念和小说艺术范式的形成中，当代文学中普遍存在问题和弊端，诸如小说对社会政治化主题的刻板演绎，“两军对垒”的模式化结构布局和类型化的性格塑造，都带来对小说真实性和人物生动性的巨大损伤。这种以单一的意识视角观照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一个时代文学的固有局限，在《保卫延安》和《创业史》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和典型，而且正因为这两本小说分别被当做当代文学的开端之作和成熟时期的范式之作，才更强烈和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文学风气，从而构成性地决定了当代小说的整体审美品格。甚至于，时至今日当代小说所面对的艺术限制，也常常能从共和国文学的发生时期，即那个时代所谓的“共同文体”或“既定常

规”中找寻到一些因缘余绪。除过这些作品本身的文学史意义和经典性的讨论，文学基因的传承和突变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是我们回返文学历史现场更为深远的意义所在。

## 二

从19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实验性开拓，到1949年后中国当代文学体系的全新建立，置身于解放区地缘文化环境之中的陕西文学，顺应文学的时代主流，凸显文学的时代风格，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陕秦历史文化的深厚渊源，陕西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生发和构成关系，持续影响和推动着陕西文学的发展，在“文革”结束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属于一方地域的陕西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继续彰显着强有力的艺术创造精神，以更具规模的群体性文学行动和昭然于世的创作成就，赢得读者和评论界长久的关注，甚至带来全社会的轰动，不断证明着陕西文学重镇的艺术创造实力。

1986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问世，1988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出版，从两位作家个人来说，这是他们在前期中短篇小说创作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第一次以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获得文坛和读者的广泛认可，其艺术反响持续至今。从陕西地域文学来说，“陕西作家群终于有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批长篇小说，而且一开始就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艺术品位。”<sup>⑨</sup>陕西由此迈开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坚实步伐，到1990年代，确切地说到1993年，“陕西先后有京夫高建群鄙人（陈忠实——作者注）贾平凹程海五位作家的五部长篇小说在北京五家出版社出版，形成了这个群体创作大释放状态。”<sup>⑩</sup>这就是被评论界称之为“陕军东征”的文学现象。陕西以集团军的阵势，推出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等长篇厚重之作，形成长篇小说的新一轮创作热潮。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反观当时的中国文坛，陕西长篇小说的兴盛也反映了新时期中国文学演变到1990年代的整体突进。变革时代的文学，大约会以十年为一周期迎来长篇小说收获的季节，五四之于1930年代的长篇热，共和国成立之于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长篇热，以及1980年代起始的新时期文学之于1990年代初的长篇热，大致可以看出其一定的发展规律。

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陕军东征”的斐然景观，以及“三驾马车”的斩获“茅盾文学奖”，使得陕西文坛普遍存在着长篇创作的“优胜情结”，作家誓以一部长卷定天下，评论家也惯以长篇创作论英雄。新时期崛起于文坛的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代表着阵容庞大的第二代陕西作家群体，除了领军人物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还有赵熙、京夫、邹志安、文兰、王蓬、莫伸、李康美、高建群、程海、杨争光、冯积歧、方英文等，女作家李天芳、叶广芩、冷梦等，都纷纷推出了他们长篇作品，据统计，90年代以来，陕西作家群体每年都有十部以上的长篇小说出版，这种井喷状创作态势迅速掀起陕西文学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也强力推进了新时期文学的长足发展。

陕西当代作家从第一代到第二代，既有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上的传承关系，同时又在突破与超越中呈现出鲜明的“断代”特征。两代各自有优秀的作家作为领军人物，分别形成颇为严整的群体阵势，取得了卓越的文学成就。并且，已成共识的两代代际划分，为我们整体描述陕西当代文学创作概况及其特点提供了方便的切入角度，也使我们能够将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放置于不同的参照系中，使研究者取得历史的纵深眼光。

在1980年代的文学环境中讨论路遥，核心命题就是对现实主义精神和方法的执着坚守。路遥对先师柳青有着自觉自愿的膜拜，构思《平凡的世界》时还在认真攻读《创业史》，他不但在文学观念、审美理想和创作题材、方法、风格等方面继承柳青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经验，而且一如柳青般为神圣的文学事业甘愿付出生命的全部。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之时，正是新潮文学汹涌澎湃，现代主义话题遍布文坛之际，路遥不可能熟视无睹，他后来说：“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理智清醒地告诉路遥：“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sup>⑩</sup>针对当时的“现实主义过时论”，路遥指出：“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乃至我们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sup>⑪</sup>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旧的文学样式的存留和任何一种新思潮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这也包括读者的审美需求。

因为路遥的早逝，这部用作家生命构筑而成的艺术长卷，成了路遥的巅峰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这部通常在文学从业者看来其创作方法早已过时的小说，在读者大众心中却从来没有过时，甚至因其强烈和持久的阅读效应而被称之为“路遥现象”。路遥当年所判断的：“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sup>⑫</sup>已经为作品所经受的阅读考验所印证，因此，讨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命运，《平凡的世界》越来越成为研究者绕不过去的作品。

回返1980年代文学现场，在现实主义受到现代主义的冲击，二者由理论上的矛盾对抗到创作实践中的并行不悖和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中，路遥所代表的是坚守传统现实主义的立场。路遥的成功基于两点，一是他正像前辈柳青一样，从一个作家的主体内在要求出发选择和坚持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方式，因为这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相互拥合相互适应得来的创作途径，所以非外力能够轻易影响和改变，我们知道，主客体的碰撞和融合正是艺术创造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状态。二是路遥并没有僵化地对待传统现实主义，路遥艺术个性中具有强力地突入客观世界的主观精神，他用自己炽热的情感点燃笔下的土地，与中国农民和他们的苦难命运同呼吸共悲欢。《平凡的世界》出版后，被评论界普遍称誉为“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是一幅当代农村生活全景式图画”，具有“史诗性的品格”的“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sup>⑬</sup>今天看来，《平凡的世界》能持续吸引读者，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已经远远不是现实主义小说“表现历史与社会人生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的成就所能解释。人们热爱《平凡的世界》，主要不是因为它“写了什么”和“怎样写”，而根本是因为他是“路遥写”。“谁写”谁决定小说怎样，也决定他的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怎样，路遥更多取胜于他的情感诚意和道德力量，他用艺术家的主观精神征服了小说，也征服了读者。所以路遥说：“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sup>⑭</sup>路遥在上个世纪1980年代自觉地以文学创造的强大精神效能，超越具体的艺术手段，何尝不是另一种对潮流的挑战，试想如果路遥当时追赶时髦勉强运用现代派手法，文学史上可能多了一部过眼烟云之作而不会有现在的《平凡的世界》。在中国文学史上，路遥不仅留下一部

足以代表 1980 年代现实主义水平的优秀之作，更以艺术家“直接面对读者”的独立精神，赢得后人的理解和尊敬，这也莫不是前辈文学精神的血脉流传，于今天于未来，都提供着一份特别有价值的经验。

《平凡的世界》带着非常浓重的时代印记，无论是其反映的那段变革时期的城乡社会生活，还是路遥面对生活的理性思考，也包括创作方法上近乎偏执的传统守成。成功和局限是《平凡的世界》的一体两面，黄土文化蕴蓄着强韧激越的生命原力和情感热力，同时，陕北也历史性地深陷封闭落后的经济文化形态的围困中，根深蒂固的本土思想观念带给作家的限制，并非一时的方法趋新所能弥补，相较而言，轻率丢掉人生本源和文学根系，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艺术损失，路遥对此非常清醒。路遥离世的第二年，陈忠实的《白鹿原》出版，作家在思想观念的彻底解放和艺术经验的多元融合中，实现了对传统的继承、整合和全面超越，《白鹿原》因此成为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里程碑性作品。我们不禁慨叹，在坚守到突破的过程中，所谓时代局限往往就那么短短几步。

谓为“陕军东征”而群体推出的这批长篇小说中，两位领军人物陈忠实和贾平凹创作的《白鹿原》和《废都》，引来社会上久违的文学轰动效应。时隔 20 年再来考量这两部小说，无论其思想力和审美力，都依然闪耀着思想艺术的光芒。

陈忠实与路遥一样喜欢《创业史》，崇拜柳青，他说：“除了《创业史》的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还有柳青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之外，后来意识到这本书和这个作家对我的生活判断都发生过最生动的影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sup>⑩</sup>通过与柳青的影响关系，陈忠实也表达了自己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理念和政策路线的无条件信奉和遵从。1980 年代陈忠实亲历农村分田到户责任承包的社会变革，他不无震惊地看到：“1982 年春天我在渭河边倾心尽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五十年代初在终南山下漓河边上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一个反动。完全是个反动。”<sup>⑪</sup>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化道路终被颠覆时，陈忠实意识到自己正遭遇到“必须回答却回答不了的一个重大现实生活命题。”陈忠实把由此引起的思想震荡和心路历程称之为“剥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断发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使我的创作发展到《白鹿原》的萌发和完成。这个时期的整

个生活背景是‘思想解放’，在我是精神和心理剥离。”<sup>⑫</sup>《创业史》曾经筑起少年陈忠实美丽的文学梦想，走上创作道路后，因小说被认为有“柳青味儿”而感到无比荣耀。冥冥之中像有一种力量在招引，《创业史》表现的合作化题材和现实人生发生了粉碎性碰撞，刺激陈忠实的同时也把他推到了新的转机面前。正是对合作化问题以及乡村社会变革的再思考，让陈忠实开始重新面对中国近现代半个世纪的历史生活内容，对即将进入自己小说的中国农民历史命运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陈忠实最终用《白鹿原》回答了那个萦绕于心的重大命题，也实现了他期待已久的对现实主义美学新领域的征服。

陈忠实依然怀抱构筑艺术史诗的宏伟理想，依然秉持贴近历史真实、注重生命体验、传达人性关怀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些稳固的艺术基因证明了陈忠实依然是柳青的传人；另一方面，陈忠实更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阴影。”<sup>⑬</sup>陈忠实痛下决心，自断与传统母体的“脐带”，让传统成为源头和背景，让自己成为独立的艺术生命个体，“什么时候彻底摆脱了柳青，属于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才可能产生，决心进行彻底摆脱的实验就是《白鹿原》。”<sup>⑭</sup>这种“摆脱”包括上述的与旧的思想禁锢“剥离”，“打开自己”，迎接世界观、历史观乃至人生观的全面更新；也包括解除原有艺术系统和创作模式的束缚，不再人为地固执地排拒异域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叙述方式，而是吸收和融合四面八方的和文学发展各阶段的成功经验，重新熔铸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学个性；最后归结为陈忠实很钟情的那句话：“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不仅指语言形式必须摆脱旧套，必须建立自己的语言结构形式，更进一步说，“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背后潜藏着陈忠实小说思想的一场深刻革命。一旦这场革命成功，宗师柳青和陕西地域文学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都不再是遮蔽在作家头顶的巨大阴影，而是转化为作家攀登文学金字塔的雄伟底座。陈忠实用《白鹿原》实践了一个作家挣脱传统负累飞向艺术自由王国的艰难历程，这就是《白鹿原》超越《平凡的世界》之所在，也是陈忠实以“寻找自己的句子”名闻天下，不断影响文学后辈的原因所在。

新时期陕西文学的“三驾马车”中，贾平凹

身上的地域性特征同样明显甚至典型，比如“农裔城籍”的作家身份，以土地为创作母体的文学信念，贴近现实把握时代脉搏的能力以及质朴醇厚的艺术个性等。另一方面，贾平凹又是陕西作家群落里面最另类的一个，也是创作最为变化多端的一个。在三十多年不间断的创作过程中，他一直以文学介入现实人生，承担着这一代作家的历史使命，但又比同时代作家更早地更自觉地意识到主观世界在艺术创造中的特殊作用，即使早年相对偏重于表现外部世界的作品，如《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中短篇以及长篇小说《浮躁》，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变动迹象，一定是通过作家自己的心灵响应而折射出来，因而具有了与众不同的个人艺术气象。学者王富仁早已注意到，贾平凹“是一个会以心灵感受人生的人，他常常能够感受到人们尚感受不清或根本感受不到的东西。”<sup>④</sup>这其实说的是艺术创造中的直觉现象，贾平凹能够凭借直觉感受生活进入创作，所谓“天才型”作家也是就此而言。贾平凹得以三十多年驰骋文坛，不断有新的突破和超越，很大程度上依靠了自己强大的“内宇宙”。

虽然贾平凹的创作一直被归类 and 命名，比如曾被纳入“寻根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浪潮，但就贾平凹自身来讲，却一直努力着要挣脱潮流，艰苦地找寻和建造着自己的文学世界。1986年完成《浮躁》后贾平凹说：“我朦朦胧胧而渐渐清晰地悟到这一部作品将是我三十四岁之前的最大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了，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我真有一种预感，自信我下一部作品可能会写好，可能全然不再是这部作品的模样。”<sup>⑤</sup>贾平凹就此告别了过去，大举进行新的艺术突围，迎来1990年代以来真正属于贾平凹自己的文学时代，当代文学也因此有了《废都》到《秦腔》等一系列长篇艺术作品，也因此有了“贾平凹现象”这道夺目的文学景观。

从《废都》开始的贾平凹，不断地转移着小说的表现视野，也不断颠覆着既成的小说叙述方式，这些变革性艺术实践最终通向贾平凹自己提出的美学目标：要“以中国传统的美的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sup>⑥</sup>这一努力方向使得贾平凹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了具有反叛意义的开拓，其一，他既不像路遥一样在传统现实主义格局中以主体的情感精神力量谋求突破，也

不似陈忠实熔铸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经验于对民族秘史的重新把握中，获取深厚和悲壮的史诗美学效果。贾平凹的审美理想原本就与中国现代小说传统游离着，后来彻底甩开了长篇小说建构宏大叙事的固有模式，走上完全复原世俗生活原景的路子。这样，贾平凹的创作与时代社会就形成别一种的对应关系，如评论家所言：“贾平凹这个作家永远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建立起一个非常秘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十几年前我们在《废都》中就曾经体会过，……这一部《秦腔》也是真正建立了一个非常准确而秘密联系的通道。”<sup>⑦</sup>长篇小说不再是对宏观历史进程和重大社会事件的模拟式描绘，作家也不再企图为时代精神和主流政治理想代言，小说的内容是不加择取的密密集集的俗常日子的自在呈现，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中，弥漫着我们并不陌生的那种人性“常与变”的历史思绪，而那些让人不胜其烦的“鸡零狗碎”，又一笔一笔地命中着这个时代的种种复杂问题，作家对家国命运的巨大忧思浸没在贾氏叙述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些在别的作家手里可能成为史诗性叙事的文学题材，在贾平凹的处理下完全是另一幅文学面孔了。其二，从《浮躁》到《废都》再到《秦腔》，贾平凹一直在紧张地思考小说更理想的写法，2003年他自述说：“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是什么，我的初衷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我相信小说不是故事也不是纯形式的文字游戏。我的不足是我的灵魂能量还不大，感知世界的气度还不够，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他再一次强调：“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sup>⑧</sup>贾平凹90年代以来尝试创作“由琐细写实到意态生成”的系列小说文本，致力于中国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重构的艺术实践，他将此视为小说家的艺术使命乃至人生理想，因此有了不畏人言敢为人先的胆量和勇气。在上个世纪末《高老庄》问世时就有评论家说：贾平凹“实现了对现有小说范式的大胆突围，形成了一种混沌、鲜活而又灵动，具有很强的自在性和原在性的小说风格。”<sup>⑨</sup>从《废都》的创作转型至今，贾平凹在小说民族性与现代性结合方面的艰苦努力和带给小说艺术的“原创性贡献”，已经得到了评论界极大的肯定，也激发了人们对中国小说未来发展的全新思考。

在多元开放雅俗互见的文学环境中，小说引起社会反响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曾经的热捧也罢恶议也罢，都已随时光消散，重要的是，长篇小说能否穿过时光隧道经久存留在读者的阅读视野中，并且在评论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中走向经典，陈忠实和贾平凹代表的陕西文学群落依然值得我们期待。

### 三

建国后“十七年”到新时期 80 年代文学两代作家的层次特征比较明显，而 1990 年代以来的陕西文学发展走向是不大容易准确划代的。一直活跃在文坛上的叶广芩、杨争光、方英文、马玉琛等作家，从年龄和创作资历以及创作观念和方法上，应该是属于第二代的，但他们显然已经淡化了第二代作家与柳青、杜鹏程们的那种深刻的艺术生命的联系，他们的生存方式和写作姿态显然大不同于前辈作家，他们在写作精神上更靠近第三代。可以称之为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红柯、李春平、爱琴海、寇挥、秦巴子、鹤坪、安黎、高鸿、刘晓刚、杜文娟等作家，他们在“无名”化和个人化的创作路途上走得更远，他们以“反传统”的和更具旺盛生命力度的写作，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他们进行的是更具当代性的写作，构成陕西文学的靓丽景观和新鲜活力。

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涌现的庞大数量和艺术个性的丰富多样来看，陕西依然是生长长篇小说的一块沃土，长篇的丰收也依然带给陕西文学无限的生机和希望。而且，新世纪以来的陕西长篇小说正在呈现出令人惊异的新变，正在和已经打破了既往的创作格局和评价系统，于是，我们对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现状和发展态势的考察和评判，就有了新的意义。

首先是地域性特色的淡化和隐失。评论和研究陕西长篇小说，一直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视界，就是文学的乡土性和地域性文化阐释。这一思路源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文化学研究热潮而一度成为流行，却也切近和吻合了陕西文学创作的基本状况。从柳青、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这几位小说家的长篇创作中，非常典型地体现出陕西文学以乡土叙事为主流的鲜明地域文化色彩，从乡土题材和地域文化的角度进入，很大程度实现了对陕西文学的总体观照，也相当有效地把握到了这一文学群落的文化审美特征。乡土写作曾经是陕西长篇创作的立足点和传统优势，而近年来

除了贾平凹《秦腔》引起人们对“后乡土”叙事的关注外，其他乡土题材的长篇作品并没有产生什么特殊的影响，或者说，乡土叙事本身已经汇入了新世纪文学多元化的艺术表现之中，不再占领陕西地域文学中的首席位置了。

陕西文学的乡村乡土式单色调局面在 1990 年代就已经开始改变，愈到后来，作家涉足生活的领域就愈加宽泛，小说题材五花八门甚至令人眼花缭乱，越来越多的长篇新作，难以用农耕生活和地域文化来框囿。举出较有影响的几部小说来看，叶广芩的《采桑子》动用的是与中国历史变革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满族贵胄家族生活题材，且京味浓郁。红柯一直沉醉于边疆民族自然与人生状态的意象描画，长篇《西去的骑手》和《生命树》更为宏阔地展示了草原文化和异域风情，与他大量精美的写意性中短篇小说相比，红柯的长篇小说在继续发挥其丰富的象力的同时，加强了小说还原现实的能力，标示着红柯走向虚实整合的艺术境界。杜文娟近期热衷书写旅行西藏的体验，纪实性长篇《阿里 阿里》带给读者的不只是西藏的神秘，而是阿里人真实的生存图景。方英文的《落红》和《后花园》表现都市世态人情和知识分子破碎零落的精神状态。马玉琛的《金石记》写长安城里古董界的奇人异事，小说中洋溢着古往今来的传统文人气韵。李春平的《步步高》和《领导生活》涉笔“官场”，写出了“政治生活”的新气象。秦巴子的《身体课》是一部全新意义上的“身体写作”，诗性的身体语言和智性的哲学思考几近完美地融合于一体。在当代文学从“乡土”到“都市”的转移中，陕西文学算是比较滞后的，而一旦突破“写什么”的自我限制，对文学世界的全景展示就表现得相当出色。还比如近年崛起于文坛的一批新锐女作家周瑄璞、唐卡、王晓云等，几乎都是擅长都市题材的，她们笔下的“欲望都市”和深陷其中的女性形象，让我们完全读不出所谓的地域特色。超越陕西文学既成的高度，可能首先要面对飞速变化的外部世界和随之改变的人的内心生活，在文学发展新的生长点上出现的这些长篇小说，可能还没有抵达艺术自足的理想境地，但从中可以看到地域性文学新变的巨大的潜力。小说创作在淡化和隐去地域性标识的时候，也正努力走向更为壮阔的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关怀，和更加深刻的对人的灵魂奥秘的揭示。也就是说，在更加自觉地追求长篇小说普世思想价值和艺术的个性化时，不自觉地

进行了对地域文学生态的强力扭转。令人期待的是，这一文学的拓新群体，何时能够撑起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片文学天空。

与“去地域性”相联系的另一重挑战，是长篇小说对“厚重”的“史诗性”艺术使命的卸除。“史诗性”追求是陕西文学最引以为豪的伟大传统，“去史诗化”意味着要比前一代作家更加彻底地摆脱文学宗师的影响，在“反传统”的路上走得更远。叶广芩的《青木川》试图拨开主流话语构建的“大写的历史”而寻找存活于民间记忆中的“历史真相”，她没有刻意于小说的“史诗性”营造，却在接近和走入历史现场的努力中，讲述那些纷繁杂乱而又逸趣横生的民间故事，发现其中人性的美好与幽暗。方英文和马玉琛的小说用不同的笔墨展示了当下文人普遍存在的回归古典、民间与故园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取向，反拨了长久形成的知识分子以承载政治道德理想为文学诉求的小说传统。擅长写老西安的作家鹤坪新近推出一本《民乐园》，满篇的市井男女与古旧风烟，他用百年西安的风俗民情构筑的“文学历史”，显然是更远离宏大叙事传统的。长篇小说的简约化和轻灵化是易引起文坛批评的一种创作倾向，对简与繁、轻与重和俗与雅的不同价值认定，反映的还是一个文学思想和小说观念问题。小说的“宏大叙事”和“史诗性”追求在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语境中生成，负载民族国家复兴和社会政治变革使命的小说观念，长久地影响乃至决定着作家的艺术创造和读者评论家的价值评判。事实上，很多小说家离开传统而毅然转身，是中国社会再一次重大变革的力量推动而致。当我们身处自由、松散和满地文化碎片的多元化世界，小说为实现多种功能意义而选择不同的创作路向，也是一种必然。有意思的是，当小说背离了近传统，开始亲近民间认同世俗乃至走上市场化的道路时，却续接了中国小说传播“街谈巷说”、意在娱乐消闲的远传统。到底什么是好小说？当然不可能再用同一种标准衡量五花八门的小说创作了。

“地域性”和“史诗化”中隐含着集约和趋同的意思，真正出色的小说家，即使以地域特色和史诗品格为标记，也一定要将不可复制的创造个性体现在小说当中。在陕西地域写作中，贾平凹是最出格、最另类，也最多引起争议的小说家，如前所述，他是较早意识到传统的史诗性框架和写实方法对自己的束缚进而求新求变的，长篇《浮躁》完成后开始新的艺术突围，从《废都》

《白夜》，一直到《秦腔》《古炉》和最近的《带灯》，贾平凹在自认为适合自己的路上坚定不移地走来，文学潮流不断更迭变迁，争议乃至批判持续存在，贾平凹不为所动地坚持，成就了他自己的文学风景。这应该也是贾平凹30年处于文学主流的边缘而又30年立于文坛前端的原因所在。贾平凹善于守着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地，却开掘出一个全然异质的文学世界，贾平凹属于陕西地域，却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学。贾平凹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对陕西后代小说家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创作路子，应该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是作家“去地域性”和“去史诗化”的自觉努力造成了陕西长篇小说的风姿不同和意趣各异，还是时代赋予的自由文化选择和个人化艺术追求，塑造出作家群体全新的个体形象，让陕西文学往日不可动摇的辉煌传统，成为渐渐远去的巨大背影？多向促进和全面生成应该是更客观更公允的答案。问题在于如何面对、如何衡量和作出评判。从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出版的数量和花样繁多的局面看，其实是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长篇小说的繁荣时代，但萦绕于我们耳际的，充斥于各类报刊的，更多的是质疑和批评，是失望的乃至悲观的声音。走出共名时代、难以找到主色调、乃至无法完成全面阅读的长篇小说发展现状，本身就形成了对批评家新的考验。就陕西文学，我们曾经热衷并自信的地域文化性把握和史诗性评判，对于已经挣脱了地域限制的自我行走中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否永远有效？当年几部轰动性的长篇巨制就可以证明一个繁荣时代来临的评判标准，可否依然适用或切合于当下的创作实际？当小说回到小说艺术自身，回到每个爱小说和写小说者的身边，小说世界却变得和以往如此不同。一面是长篇小说海量增加汹涌而至的现实景况，一面是小说艺术全面衰退、沉沦，乃至文学将要消亡的危机预言。是我们对小说的判断力出了问题，还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小说观念以及价值认识系统？

陕西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曾经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中强有力的一脉，今天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态势，也还是中国长篇小说时代变化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表现。无论数量上的逐年成倍上升和质量上的雅俗互见参差共存，陕西文坛都可以折射出全国风貌。地域性问题放大了讲就是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对于宏大叙事和史诗性追求的反思，也是回返中国百

年文学和重估传统价值观念时难以回避的核心艺术命题。这样看,考察陕西地域的长篇小说创作群体,其意义就不仅限于陕西了。

#### 注释

①晓雷:《别样的教科书——读杜鹏程“战争日记”》,张文彬编:《本质上的诗人——回忆杜鹏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52页。

②杜鹏程:《〈保卫延安〉的写作及其它——重印后记》,《延河》1979年第3期。

③④⑤冯雪峰:《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文艺报》1954年第14-15期。

⑥陈思和:《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上海文学》1988年第6期。

⑦吴进:《柳青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⑧柳青:《关于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柳青写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04页。

⑨⑩陈忠实:《关于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回顾与展望》,《小说评论》1995年第4期。

⑪⑫⑬⑭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页,第45页,第47页,第47页。

⑮曾镇南:《现实主义的新创获——论〈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小说评论》1987年第2期。

⑯⑰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92页,第103页。

⑱陈忠实:《〈创业史〉对我的影响》,《中国文化报》2010年5月9日,第3版。

⑲⑳陈忠实:《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答问》,《陈忠实创作申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年,第34页,第35页。

㉑王富仁:《〈废都〉漫议》,《王富仁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㉒贾平凹:《浮躁·序言之二》,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

㉓贾平凹:《平凹文论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㉔《〈秦腔〉:乡土中国叙事终结的杰出文本——北京〈秦腔〉研讨会发言选摘》,《〈秦腔〉大评》,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㉕贾平凹:《我心目中的小说》,《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

㉖雷达:《贾平凹的〈高老庄〉》,《小说评论》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 王雪松

## Intergenerational Evolution and Artistic Contribution of Contemporary Novel in Shaanxi

Zhou Yanfen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2027)

**Abstract :** This paper regards the creation of novel in Shaanxi as a stylish local existenc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aking regional Shaanxi litera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novel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Shaanxi novel's unique artistic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s well as its historical limitation, current difficulties. It further introduces a prospective thinking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 Shaanxi; novel; intergenerational evolution; artistic contribution